

# 高等研究院体制： 普林斯顿的经验、挑战与改造<sup>\*</sup>

● 孙 华

**摘要：**高等研究院体制作作为学术创新的一种制度设计，已经得到全球的认同与接纳。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成功经验是高起点的组织定位、高度的学术自由、高端的研究团队、高品质的学术建制和高额充裕的运转经费。随着世界范围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高等研究院体制今天正面临包括高端人才、经费筹措、学术自由以及科研合作等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也对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高等研究院造成冲击。结合中国现实改造普林斯顿经验既是我国高等研究院体制良性发展的关键，也能够为我国的“双一流”建设提供有效借鉴。

**关键词：**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改造

近年，美国设立于1930年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Princeton)已经成为全球争相仿效的科学研究范式。在我国，自1994年西安交通大学率先成立西安交通大学工程与科学研究院以来，随后一批知名高校纷纷跟进，比如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1997)、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1999)、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2005)、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2008)、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2009)等纷纷创建，港台地区则有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2005)、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2006)等。

这里所谓的“高等研究”，按照邓正来教授的观点，至少有以下两个特点：首先，它是指一种学术建制，亦即一种有别于大学的、纯粹的学术研究建制；其次，这种学术研究建制予以推进的乃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所不能充分保证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基础性、前沿性的高端研究。”<sup>[1]</sup>所以，本文所指的高等研究院是有别于大学和国家或企业科研院所体制的，独立且专门从事高深性、基础性、前沿性、原创性、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纯科学研究机构。

尽管高等研究院模式在全球风行一时，但是论建树和成果，却无人能及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截至2015年，85年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已诞生3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全部56位菲尔兹奖(The International Medals for Outstanding Discoveries in

Mathematics)获奖者中，普林斯顿高研院教授和客座研究员占去41席，此外还包括一批沃尔夫奖(Wolf Prize)和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Fellows Program or MacArthur Fellowship, or Genius Grant)获得者。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奥本海默、波尔、泡利、哥德尔，现代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经济学家约翰·纳什、诗人艾略特等等以及华人世界的华罗庚、陈省身、李政道、杨振宁、丘成桐等都曾经是这里的研究者。

对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功经验的研究，可以使我们理性审视学科高度分化时代和大学世俗化背景下的知识生产模式，尤其是基础性、原创性和前沿性的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这不仅可以为我国高等研究院的理性发展和良性运转提供借鉴，同时对我国的“双一流”建设也必将提供有效路径引导。

## 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之成功经验

作为一个私立的、独立的、非营利性的科学研究实体，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虽然毗邻普林斯顿大学并和普林斯顿大学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但是却隶属于普林斯顿大学，当然，它也具有政府的科学院性质，作为一个纯粹的民间机构，它又不同于盈利性的兰德公司。概括起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经验主要有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关系研究”(BIA130059)、西安外国语大学人文社科研究中心与陕西省人文社科青年英才支持计划(HSSTP)的研究成果之一。

孙 华/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教育学院院长，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

五个方面。

### (一) 高起点的组织定位

现代大学的院系所设立以学科划分为标准,有利于专门精深的知识传递与探究,但是在本质上也割裂了知识整体性与内置的联系,制约了科学的发展。“一开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以弥补现代大学学科建制的不足而登上历史舞台的,这一学术研究建制推进的正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所不能充分保证的、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学科为分界的基础性、前沿性的高等研究。”<sup>[2]</sup>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致力于鼓励和支持科学和人文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即有助于产生新知识的原创性,常常是纯理论的思想,它将改变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sup>[3]</sup>“始终致力于纯粹的科学探究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最大特点。这种‘纯粹性’摒弃了一切功利性的服务职能,它不承担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职能,只做纯粹的学术研究。”<sup>[4]</sup>更为重要的是,它致力于“无涉利益的知识探寻(the disinterested pursuit of knowledge)”<sup>[5]</sup>。

在定位上,高等研究院是世界领先的理论研究和知识探索中心之一。“研究所存在的价值是鼓励和支持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基础性研究。它提供了由导师指导的学者和一个宽松的研究环境。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与文化传统造就了研究院在广泛的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贡献。”<sup>[6]</sup>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始终致力于对未知世界进行基础性探索,秉承小而精的发展原则,不仅汇聚了对知识有着本能敏感与执着的天才般的一群大师学者,而且能够让他们快乐而轻松地从事研究,即提供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与优厚的经济待遇。

### (二) 高度的学术自由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体制成功的核心之一就是学术研究的无规划,有方向;无目标,有宽容;无考核,有褒奖;无管理,有服务;无学生,有学科。研究院不设置任何名义的学术委员会,不培养研究生,不颁发学位,教授没有任何教学要求。一切均按照弗莱克斯纳的理想去规划,普林斯顿高研院由一批独立而卓有成就的顶级学者构成,学者们独立进行自己的专业研究,无需向任何人汇报,也没有谁去考核他们。

以爱因斯坦于1933年从欧洲来到这里为标志,这个世界级学术殿堂就迅速汇聚了一批非凡人物,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就开始获得“学者的天堂”的称赞。这里集聚了全球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哲学家、天文学家以及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的资深研究者。虽然每一个领域没有确定或预设的方向,但是,

每一个学科大师就是方向。这种机制保证了学科发展与人员延聘之间的高度自由组合。普林斯顿研究院秉承延聘一流人才并使之快乐(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的理念,以2007-2008年度为例,研究院所有的大师级学者每人拿着不少于25万美元的年薪,同一年度哈佛大学正教授的平均工资则是18万美元,而他们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做“罗丹式的思考”。

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是一种基于个人兴趣的闲情雅致的好奇,基础条件是知识分子们的身心自由与生活无忧。纵观科学发展史或知识进化史,无论是自然知识还是人文社会知识,也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概莫如此,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近代工业革命,直至当代,那些基础性、原创性、前沿性的重大理论发现无不得益于学者们的终极爱好和宽松的外在条件。欧几里得几何、逻辑学、微积分、日心说、进化论、相对论、量子力学、基因学说……尽皆如此。

相对而言,技术性和应用性研究的突破于近代以后,尤其是二战以后则更表现出一种鲜明的“规划倾向”与市场导向,越来越多的知识生产依靠政府的规划与市场的需求,而这些显然是与实用主义和技术主义相关的。基础研究有探索性、创造性、继承性等基本特点,更有周期长、难度大、不确定性高、回报慢的特征,虽然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内部动力,但是基础研究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公用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身份,基础性知识类似于公共物品,社会系统中没有人愿意为此买单。

政府由于其性质无疑应当担负起资助基础研究的责任,但是政府的任期制所导致的政绩倾向以及科层制所诱发的管理惰政容易产生对基础研究的短视和规划行为,另一方面,行政官僚群体的科学素养与专业性不足又加重了这一倾向。与此同时,大学也在国家主义和经济发展的胁迫下开始“直接服务社会”。于是,基础研究遭到根本性削弱。

这样,一方面,整个社会对基础研究的削弱不断减缓和制约应用研究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来自政府“规划”的基础研究又无法关注和照顾学者的兴趣与研究周期。而公益性质的民间捐助则起到了补充的作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学术自由性质和作用也自此而生。

### (三) 高水平的研究团队

毋庸置疑,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不朽业绩应当直接归因于其高水平的研究团队和世界级学术大师。

在人员组成与学术队伍方面,普林斯顿高等研究

院体制可圈可点。高等研究院分为四个研究所和两个新建单位(即,近年成立的“理论生物研究中心”和“其他项目组”):数学研究所、自然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每个研究所均为6人编制,都是领袖或大师级人物。高等研究院的行政机构设在院一级,各所不设所长,只设1个办公室主任,每位教授都配有秘书。通过邀请或个人申请,每年都有一百多位世界各知名高校的杰出学者到此开展学术研究。遴选标准不以申请者的身份比如种族、性别或信仰为依据,只考察其学术水平。当然,不同研究所的遴选准则与入院访问时间也各不相同,研究年限长的可达三到五年,比如数学与物理学科,且这两科申请人数较多;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则相对灵活,入院研究时长一般为一学年,也有短的不超过一学期。

与世界上其他研究院不同的是,这里没有任何教学课程,没有任何研究项目,更不受赞助者的压力。在普林斯顿高研院,学者们完全自由地从事探究和追逐各自的学术爱好,不问方向,不限时间,思考成为他们唯一的工作。建院伊始,弗莱克斯纳专注于筹划研究院研究什么,如果定位全球顶尖学术研究机构,研究领域就必须有所取舍。他的原则是:先要物色卓越的人才,然后发展他们擅长的学科,而不是先决定发展什么学科,才去找人。”<sup>[7]</sup>他从欧洲请来了爱因斯坦,所以就有了理论物理学的研究方向,延聘到理论数学大师冯·诺依曼和赫尔曼·魏尔,就为他们搭建理论数学的研究平台;找到了欧文·帕诺夫斯基,研究院就发展了欧洲艺术史研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始终秉承着“人才第一”的发展战略。事实上,这种理念和经验也成为后续相继成立的其他高等研究院的行为规范。

爱因斯坦在那里虽然没写什么文章,但他曾经同时指导40个人,大都成了领军人物。不考核,即使多年没有什么成果也没关系,但看人不能看错,起码要把第一个人找对。他们选人的机制其实非常简单,高等研究院院长受命于董事会,董事会找来的院长必须由所有的终身教授投票通过,确保院长不能是糊涂人。院长未必是一流科学家,但只能稍差一点点。他们的体制也非常特别,比如数学所有5个教授,缺1个教授。第一个途径是院长提名,让5个教授投票,缺1票都不行。第二个途径是5个教授联合提名,但是必须得院长同意,有一个不同意也来不了。这个相互制衡的机制既简单却又有效。

#### (四)高品质的学术建制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学术建制既有传统学院的“象牙塔”体制的优势,即,让那些醉心于学术的优秀学者能够静心无虑地思考,也兼具考虑学科交叉融

合与团队科研的平台设计。前者主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人文学科,其学科性质决定了它的研究范式以个体为主,后者则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

从科技哲学的角度看,本质上,“高等研究院”这种研究体制既不是知识生产方式的“学院模式”,即所谓“模式I”,也不完全是知识生产后学院模式,即“模式II”,而是结合了两者的优点。作为认识 and 理解的源泉,学院模式由探索未知和探求真理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驱动,由研究者的个性或人格决定。进一步而言,在学院科学这种高度个人主义的文化下,研究者可以自由地思考和研究他们自己选择的有趣课题,并产生公共的普遍知识和对自然及其规律的理解,而不必考虑实用的目的和外“使命”。<sup>[8]</sup>但是这种机制容易造成学科分化、彼此分割、互不往来的研究格局,影响科学研究的发展。

后学院及大科学时代的知识生产模式II是跨学科的,主要针对现代社会复杂的综合性问题,比如环境污染与治理,既关涉生物地理气候等学科,还牵涉数理模型与伦理法律等。同质性是知识生产模式I的主要标志征,模式II恰恰相反,呈现异质性特征。另一方面,模式I体现的是等级制且习惯于维持这一态势,模式II则表现出多变的非等级化异质性倾向。两者相比,模式II的知识生产指向的是科学与人类的社会责任,并附有反思性。“模式II涵盖了范围更广的、临时性的、混杂的从业者,他们在一些由特定的、本土的语境所定义的问题上进行合作。”<sup>[9]</sup>“从模式I到模式II,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转型,反映了社会对知识生产新模式的需求。当然,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即布鲁诺·拉图尔描述的“科学”的文化向“研究”的文化的转变。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已经转变成共谋关系。”<sup>[10]</sup>模式II的不足是外界干扰和业界的诱惑。实用主义的市场化需求容易导致学者的价值理性出现偏移,进而影响基础性和公益性的纯科学研究。

普林斯顿体制混合了知识生产的模式I和模式II,这就可以使学者们相互独立又彼此合作,既在传统学科做深度思考,又横跨学科界限展开交叉研究并摆脱了外界压力。这种学术建制对于促进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发展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原创性研究具有深远意义,非功利化的基础性研究条件之一就是学者们这种自为自发的探索精神。由于跳出了利益的桎梏,免除了物质匮乏,排除了机制干扰之患,这些学者们可以无忧无虑地从事各种自由选题和具有基础性价值的研究或尝试跨学科交叉研究,这种独具一格且符合学术研究规律的学术建制,成就了普林斯顿高等

研究院的辉煌。

### (五)高额充裕的运转经费

现代科学研究的外部条件之一就是高投入。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大额经费主要用于研究支出和学者们的生活待遇与报酬。普林斯顿的主要经费来源于社会捐助,为了保证科学研究的中立性和自主性,虽然运转经费中有来自政府的一块,但却不是主要来源,为了免于政府或国家权力的横加干涉,政府投入的资金模式只能是捐助和资助,而非拨款,来自市场或企业的资金也同样如此。

由于高等研究院的研究“没有计划,没有任务,研究什么,怎样研究,一切听任学者们自己的想法,研究院只负责向各位学者提供足够的经费”,<sup>[1]</sup>所以它并不能产生经济利益,更遑论现实利益回报,这种将“需求”为导向的市场竞争机制排除在外的运行模式注定不能“自我造血”,而是要将外部“输血”进行到底。所以其运转就必须有雄厚的、稳定的资源保障。事实上,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资金与资产相当雄厚。2011年度其资产总额已逾6.90亿美元,75%源于个人捐赠。2014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资产总额超过8.58亿美元,其中捐赠总额超过7.41亿美元,占资产总额的86%。不仅如此,高研院的资金来源还包括联邦政府、国家科学基金、国家人文基金以及联邦能源部和国防部、联邦国家健康中心和国家安全局等不同单位的捐助。此外,还有新泽西州政府对理论计算科学和IAS/PCMI数学创新计划的专项支持,以及部分客座研究员带进研究院的外国政府与基金会的资助。虽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运转主要来自私人捐助和政府资助,但其研究却不受政治意识形态和项目资助方意志的制约,从而保证学术的纯洁性和自主性。显然,这对基础研究意义重大。

美国民间捐助的传统以及法律层面的免税等一系列完善的制度设计和政府基于发展基础科学的战略规划而自愿“无偿提供”的捐助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获得了充足的运转经费,这是研究院得以有效运行的基础之一。

## 二、普林斯顿研究院体制的当下挑战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开创了科学革命的新格局,颠覆了传统大学的学术研究范式,为科学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于是,随之而来的是世界范围内高等研究院模式的兴起。这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德国埃森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Humanities, Essen)、加拿大高等研究院(Canad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Scientifiques)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高等研究院等。

但是,今天的世界格局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与当年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筹建时代已非同日而语,普林斯顿体制面临着更多的挑战。随着高等研究院在全球数量的增多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今天的高等研究院发展也面临着若干新问题。

第一,资源的挑战。高等研究院的本质属于非营利性学术机构,所以,它必须有固定且充裕的经费资助渠道。发达国家大多是个人的捐资和政府资助两种研究资金来源,但是,在科学意识和捐助习俗尚未形成的氛围中,其资金来源必将受限,尤其在缺乏捐献传统和相关法律支持不健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而单纯的拨款又势必影响研究的中立性与非功利性。因此高等研究院的经费问题已经成为这一体制成功与否的首要问题。

第二,人才的挑战。全球招募学术大师的发展模式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立时尚可实现。因为当时战争压力和社会政治背景之故,一些知名科学家为逃离欧洲战争或政治迫害而进入美国,进入普林斯顿高研院为他们开展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现在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普林斯顿高研院当初的人才延揽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对全球顶尖人才的争夺已经白热化,全球范围为数不多的大师级人物也大多采用客座教授的形式回应各国的人才争夺,但是这种形式究竟对某一国家或某一所高等研究院可以起到多大作用目前尚无定论,他们是否真正能够提高相应的高等研究院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需要作进一步的审慎考量。

第三,学术自由的挑战。学术宽容与学术自由是高等研究院成功的基础之一。陆续成立的高等研究院对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理念与机制的借鉴是否能够有所发展?众所周知,普林斯顿高研院的使命是基础性研究,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坚持基础性研究就意味着时间与资源的巨大投入和对失败的宽容,但是在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甚至在一些学术自由欠缺的环境中,众多的追随者(举办者)能够在多大范围和多长时间容忍学者们的“自由探索”同样值得关注。

第四,科研合作的挑战。学术合作是目前科学研究尤其是大科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所以德国的埃森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就普林斯顿高研院的“独立研究”理念改造为“合作研究”,他们坚持认为合作的效果优于个人探究,思维的碰撞才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之一,所以就必须要用合作与开放的方式管理科研

团队。既然如此,那么基于个人水平的、独立的基础性研究怎样管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理论研究以及自然科学领域的大科学、大工程环境下的基础性研究又应该怎样组织和运行?这既牵扯到后续相继成立高等研究院的使命定位又关乎其具体的管理机制。

### 三、我国高等研究院的发展及其改造建议

#### (一)我国高等研究院发展现状

自1994年西安交通大学设立高等研究院起,目前我国大陆已经有十多所“985工程大学”设立高等研究院,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211工程大学”和地方大学也设立了高等研究院。这些高等研究院的性质虽属大学下设机构,但是在组织目标和定位上分明是效法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以及境外其他高等研究院。为研究之便,我们以部分“985工程大学”高等研究院为例。详见表1。

表1 部分“985工程大学”设立的(典型)高等研究院

	组织宗旨	人员性质	组织构架	研究领域
复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基于中国立场和视角对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理论建构,对当下中国问题的跨学科深度研究,推动中国优秀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	设有专职研究人员,采用名誉教授、特聘讲座教授、学术委员、特聘研究员、双聘与兼职教授方式延揽人才,招收博士后	学术顾问一名;名誉院长两名;院长一名	人文社会科学
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	促进人文科学内部、人文科学与社会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跨学科交流,实现传统文化的发展与转化	设立专兼职研究队伍,设立访问学者席,招收博士后	研究系统与行政系统分设,另设顾问、咨询和学术等三个委员会和四个研究中心	人文社会科学
人大可持续发展高研院	把一切理论置于历史视野之中、采用多种理论视角,借助理论来提出问题而不是给予答案	常在学者、客座教授;招收硕博研究生与博士后	学术委员会	历史与社会
浙大求是高等研究院	创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人文和政策环境,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攀登科学高峰	享有特殊的人才引进、聘用及考核政策,设立以博士为主的查氏特聘研究员岗位,招收硕博研究生	三位查氏讲座(顾问)教授轮值主席一职	纳米、信息、生物医学工程;临床医学;神经生物学等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加强清华大学的基础科学研究;培养有创新能力的科学人才;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逐步形成本校基础科学研究优势,推动学校理科建设	著名学者担任讲座教授;招聘博士后和博士研究生;以长江讲座教授的方式,聘请美国一流大学年青学者每年工作1—2个月	名誉院长、院长、副院长、院长助理、行政秘书;基金会;学术委员会	凝聚态物理;冷原子物理;计算机科学;理论生物物理;数学
北师大人文宗教高研院	搭建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与交流的平台,培养知行合一的高端人才	全球范围内聘请人文宗教领域的著名学者担任兼职教授、客座教授、讲座教授	院长、副院长各一名以及四个业务部门;国际交流部;学术研究所;教学培训部综合协调部	宗教学、史学、哲学、训诂学及诠释学
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研院	从事前沿学术研究,培养青年学术人才,建设大学文科队伍,探索通识教育,组织关于重庆市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以及转型时期重要问题讨论	设立专兼职研究队伍,接受访问学者,招收硕博学生	院长;学术副院长;行政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以及五个研究中心	人文社会科学和博雅教育

(注:本表以类型合并法绘制,即性质相同或结构相似的高等研究院只取其一或其中有代表性的列出。统计资料不含港台高校。)

从表中信息和其他相关资料分析,作为一种借鉴和改进的新生事物,我国的高等研究院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由高校设立,与所在高校存在隶属关系,校方(官方)拨款为主;第二是大部分招收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第三是均采用较为灵活的人事政策;第四是大多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第五是部分高等研究院提出服务学校或区域发展等方面的组织目标;第六是大多采取常规的行政管理构架。

这种设计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传统,突破现有体制实现人才汇集,能够保证高等研究院在我国现行高校环境中得以相对集中资源和力量从事高端性和交叉性、基础性研究,并从事高级人才培养,对高深学术研究具有一定保障和促进作用。这种体制模仿与改进在学科分化日益加剧的大学内部,有利于科学研究的综合化与集成化,为学科交叉与学术合作提供平台和机制,这对高深前沿学术的探索大有裨益。同样,对于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备受质量指责的中国大学,这种体制对于培养大师和领军人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大师+梯队”的配置有利于年轻学者的成熟和成长;类似于精英学院或博雅学院的小班制、综合性实验班等办学形式有利于精英教育的开展。

但是,也应当看到,具有鲜明本土改进色彩的我国高等研究院在制度设计和组织宗旨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隶属关系不能保证研究的中立性,单一的官方拨款容易影响学术的自由度,教学任务势必分散学者精力,功利性的组织目标极易制约基础研究的展开,管理制度依旧缺乏灵活性。

#### (二)我国高等研究院发展的政策改进

借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经验模式,参考当前全球文化、经济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态势,我国的高等研究院发展必须关注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首先,确定“高等研究院”或类似机构的组织使命必须是从事基础性、前沿性的高深知识研究,形成非功利化的纯科学研究中心,而非应用或开发层面的研究,也不宜以服务区域为目标。同时,在学科方向、研究领域等方面应当回避与国家科研院所之间的重复建设,实施错位竞争,这不仅有利于国家层面整体的科研发展,避免资源浪费,也更有利于这类高等研究院汇聚人才、争取资源,形成特色。

其次,在经费与体制方面,可采取校方控股、多方投资、公益定位、面向基础研究、董事会管理的制度设计,形成完备而科学的管理体制。在大学(政府)拨款的同时,应当广泛发动社会捐助。当然,如果要保证高

等研究院的学术自由,就必须强调无论是拨款还是捐助都不得附加任何条件。研究院只遵守学术规范、国家法律和组织章程,而不对其他任何要求或指令负责。这是因为目前我国大多数高等研究院是在高校系统中设置的,为保证科学研究的中立性和非功利性,不至于使高等研究院沦为大学中一般性质的研究所或院系,甚至避免成为企业或社会组织的横向课题承包者,在管理机制上最好形成一整套有利于保证高等研究院学术自由和高度自治的管理章程,并以一定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使高等研究院成为高校中的“特区”,确保研究院的高度独立。高等研究院的内部管理构架和机制可以借鉴普林斯顿的有效经验,保障高等研究院的学术自由和研究中立,尊重学术规律,倡导学术宽容。

再次,在学术建制上,应当借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成功之处,即综合知识生产模式 I 和模式 II 的学术建制形态与组织构架和运行机制。这种学术建制既保证了学者充分的个体独立与自由,又为跨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了平台和机会,从而规避了单一性质的传统学院制度和政府或企业研究院体制的先天弊端。毕竟当前的世界环境以及科学发展水平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立之初的环境已不可同日而语,大科学、大工程、大尺度、跨学科的研究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科学发展的主流路径,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大规模的科学合作。然而,学者的独立自由品性、学科的差异性仍然对学院模式,即知识生产模式 I 有着较高的需求和依赖。

关于学科方向,可沿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模式,只设定研究领域而不预设方向,以能够延聘到的学术大师方向为方向,并以此为基准配置资源,组建梯队。当然,大师级人才的延聘也应考虑院校的学科优势与学术底蕴。这是因为全球学术大师的稀缺性,我们预设的方向也许无法聘请到合适的人选,所以不宜预设方向或专业。如果没有学科与研究基础,盲目上一个学科未必能够达到预期效益。当然,也只有依托学校现有优势学科基础,才能在“双一流”建设中,形成自己的品牌与特色。人才的遴选与延揽方面,建议借鉴大多数高等研究院的“杰出学者”+“科研团队”的模式。全职引入学术大师当然是上选,当然也可以是客座形式,引进大师级别的人才旨在发挥他们对科研梯队的指导和培养,以及基础研究的指导和规划,应当借助学术大师的学术视野与能力搭建平台、建设团队、培养人才。应注重从“引进大师”转化为“引入大师的头脑”,使研究院的学术梯队有机会与全球高级别的科学思想进行对话、激发科研思路。切忌把

他们的作用仅仅定位在“科研走穴”或科普讲座上。在研究院长期聘任的学者遴选方面则完全可以借鉴普林斯顿的机制,即院长与教授互相制衡,确保入选人员的水平。

关于高等研究院的人才培养,原则上应当限制在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层次,最好是博士后。硕士以及本科生的培养会分散研究院学者的精力。原则上,我们不能把高等研究院定位为博雅学院或精英教育,这不是高等研究院的职责。

最后,在审慎选定学者以后,研究院应不设目标、不定考核、学术自由、高度自治。传统上,在知识生产中,大学教师(研究者)行为的功利取向的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并非总是能做到相互协调和平衡。<sup>[12]</sup>而这种制度设计保证了研究者可以心无旁骛、毫无牵挂地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这不仅仅因为科学的方向和目标以及进程是无法预设的,而且,规划目标以及定期考核容易破坏学者基础研究的兴趣和学术研究的规律。这一要求与经费投入以及管理体制一起,构成了高等研究院发展的必要条件。

#### 参考文献:

- [1][2][5] 邓正来. 高等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邓正来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N]. 文汇报, 2008-12-27.
- [3][6]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Mission and History[EB/OL]. <http://www.ias.edu/about/mission-and-history>.
- [4] 张会杰. 何以成为学者的“天堂”——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发展理念、研究模式以及成功关键[J]. 世界教育信息, 2009, (9).
- [7] 王则柯. 人才优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创立[J]. 书城, 2000, (4).
- [8] 洪茹燕等. 后学院时代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再审视[J]. 自然辩证法, 2008, (6).
- [9] 迈克尔·吉本斯等. 知识生产的新模式: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动力学[M]. 陈洪捷, 等,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3.
- [10] Laurens k. Hessels, Harro van Lente. Re-thinking New Knowledge[M]. Produc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a Research Agenda. Research Policy, 2008: 740—760.
- [11] 许晨. 立足现代追求卓越——弗兰克斯纳的现代大学理念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建立[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5, (8).
- [12] 蒋友梅. 知识生产中大学教师行为的功利取向及其限度[J]. 江苏高教, 2015, (2).

(责任编辑: 金传宝)

